

风雨同舟

1、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历程

中国民主促进会，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，成员主要是文教、出版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。马叙伦、陈巳生、王绍鏊等人为常务理事。民进《对于时局的宣言》主张，国民党“自动改革政权，实现民主”，要求“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，立即五条件的停止内战”，“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”，民主“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”。

1946年1月，民进发表了给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，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，保证人民一切自由，组织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。5月，为了扩大和平、民主力量，民进联络团结了上海六十多个群众团体，组织成立了“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”。6月，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，民进领导人马叙伦、雷洁琼参加了赴南京请愿和平代表团，马叙伦为团长。在南京下关车站，代表团就遭遇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，马叙伦、雷洁琼等人被打伤。

1947年下半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后，民进转入地下，以化整为零，分组活动的方式，继续进行反蒋反美的斗争。1948年4月，民进针对国民党演出的伪国大丑剧，在香港发表宣言，对国民党一手操纵选出的总统、副总统和伪国大的一切决议以及未来政府和现政府的一切行为，表示一概否认，并宣告中国人民要消灭南京独裁政府，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。

马叙伦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杰出的革命领袖、中央主席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、教育家。马叙伦早年参加过同盟会，担任过北大哲学系教授。1936年先后发起组织“北平文化界救国会”、“华北民众救国会”。抗战胜利后，更加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，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。他曾说：我“在热血沸腾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投入反内战、争和平，反独裁、争民主的洪流中去。”“下关事件”的发生，使马叙伦更加坚定了与反动派斗争到底，将生死置之于度外的决心。昆明“李闻惨案”之后，马叙伦怀着悲愤的心情，写文章抗议，“革命者是杀不完的，他们好像是春天的草，生生不绝，而且‘更行更远还生’。”“我的历史上一部分和李、闻两先生相同，我自然准备着接受一颗子弹，但我预备着送还他们一颗原子弹。”

1947年，国民党颁发了《堪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》，镇压民主运动，马叙伦胸中怒火燃烧。他致信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张群，抗议国民党的特务统治是“明季厂卫之行”，并郑重声明：“至伦立身，本末不移，贫富威武，无动于衷，达观早成，生死一致。自今以拥疾之躯，待命陋巷之内，捕杀不辞，驱胁无畏，穷以私剑，投诸浊流，皆系于政府，于伦无与焉。”信中体现了马叙伦威武不屈、正义凛然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

这一年的10月30日，他为子女立下了遗嘱。遗嘱中说：“余如逮捕，必无幸生，求仁得仁，无所归怨。余虽不见夫已之亡，汝曹必能见之，则犹吾见也。余之遗体，为若毁弃，不必寻求，皮囊盛血，本无足珍；苟得见归，即付诸火，期于悉成灰烬、播散海陆。汝曹欲寓纪念，可于吾母前立石，仅足书姓名，勿事增华也。”遗嘱字字句句，视死如归，无私无畏，体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宽广胸怀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民进以中小学教职人员和文化出版界人士为主，也有一部分在社会上

有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及大学教职人员。1950年4月24日，中国民主促进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会议通过了《关于接受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为本会纲领的决议》，并郑重表示，本会将尽一切努力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与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彻底实现这一共同纲领而奋斗。

2、民主革命时期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历程

九三学社，其前身为民主科学座谈会，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后期。当时，重庆的科技界、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些民主人士，对时局深感焦虑，经常相聚座谈时局。这种相聚座谈经常在许德珩、劳君展的家中举行，经常参加的人有梁希、潘菽、税西恒、黄国璋等人。座谈中大家深感有必要进一步团结起来，组织起来，于是便把这一座谈形式固定下来，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，其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，为团结抗战、争取民主而奋斗。

1945年9月3日，抗战胜利，为纪念这伟大的日子，民主科学座谈会为此改名为九三座谈会，但是，与会同志希望座谈会发展成为永久性的组织，以便长期存在和发展。在酝酿期间，毛泽东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。在毛泽东的鼓舞和推动下，决定把九三座谈会改建为九三学社，成立筹备会并在《新华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发表了宣言。1946年5月4日，九三学社正式成立。九三学社成立以后为争取国家的和平、民主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

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领袖、创始人。

许德珩早年参加同盟会，在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中，他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。他起草了《五四宣言》，参加了示威游行，被北洋政府逮捕。大革命时期，当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、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务。

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许德珩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在北平各高校演讲，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，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。因此而遭国民党当局的逮捕。1935年，他积极投入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并与杨秀峰、张友渔等人组织和领导了华北各界救国会，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。当他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，欢欣鼓舞，为了表达他对中共朋友的敬意，他和夫人劳君展买了布鞋、怀表、火腿等物品委托中共地下党徐冰等人设法转送延安。毛泽东收到后，曾写信表示谢意。

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，北平文化界对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不理解。许德珩在了解了中共避免内战，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后，积极协助中共做北平文化界的思想工作，为团结抗战积极工作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许德珩曾根据周恩来的建议，回到家乡江西，担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，动员抗日，保卫家乡。

1946年11月，国民党召开伪“国大”，身为参政员的许德珩，表示没有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，他坚决不出席会议。

1948年3月29日，国民党政府宣布华北学联为中共“策动组织”，“应立即依法严禁”。当日下午，北大学生在沙滩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演讲大会，国民党当局突然宣布戒严，军警特务5000余人，将北大团团包围。北大红楼对面架起了机关枪、铁甲车来回巡逻，气氛极度紧张。许德珩与九三学社的袁翰青、樊弘教授临危不惧，如约演讲。许德珩在大会上号召，“今天的中国问题并没有解决，我们在这里纪念黄花岗烈士，就要学习他们那种牺

牲精神，与广大中国人民站在一起，前进！”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九三学社成员主要是科学技术界的高、中级知识分子。